

从金本位制到布雷顿森林体系:从旧秩序和新秩序

■向松祚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货币研究所副所长、中国农业银行首席经济学家

“四大支柱里面，最关键的支柱是金本位制。金本位制的垮台几乎就是大灾难的全部原因和导火索。当金本位制轰然崩溃之后，人们宁愿牺牲另外三大支柱，以挽救金本位制，结果不仅金本位制没有得救，其余三大支柱亦悉遭毁灭！”

19世纪西方文明的四大支柱

卡尔·波兰尼的名著《大转型—我们时代的政治和经济起源》一开篇就写到：“19世纪的人类文明基于四个支柱。第一个支柱是欧洲的权力均衡体系，一个世纪以来，权力均衡体系没有让主要列强之间爆发大战。第二个支柱是国际金本位制，它象征和维系着世界经济的有效运转。第三个支柱是自我调节的市场体系，它创造出前所未闻的物质财富。第四个支柱则是自由的主权国家。四个支柱里，两个是经济支柱，两个是政治支柱；或者说，两个是国内支柱，两个是国际支柱。它们共同决定了我们这个时代文明的基本特征和历史演变的基本轮廓。”

“四大支柱里面，最关键的支柱是金本位制。金本位制的垮台几乎就是大灾难的全部原因和导火索。当金本位制轰然崩溃之后，人们宁愿牺牲另外三大支柱，以挽救金本位制，结果不仅金本位制没有得救，其余三大支柱亦悉遭毁灭！”

当我们今天拜读波兰尼的这些论断之时，可能觉得实在令人难以置信。金本位制对人类文明具有如此重要性吗？或者更一般地说，国际货币体系对人类文明具有如此重要性吗？然而，如果我们记住本卷前面引述的蒙代尔和德斯坦的著名论述，那么，我们对于波兰尼看似惊人的论断就需要反复思考。毫无疑问，为理解今天的全球金融资本主义，我们无论如何强调国际货币和国际金融体系的重要性，都不会显得过分。只不过我们长期囿于封闭经济体系的思维模式，所以往往忽略国际货币和金融对全球经济、金融乃至整个人类文明的重大影响。

波拉尼的基本逻辑相当严密。19世纪欧美经济已经演变成为一个自由市场占据支配和主导地位的经济体系，对内是自由市场，对外则是自由贸易。19世纪的西方文明或欧美文明的基石正是自我调节的市场经济体系，自我调节的市场机制开启了一个人类文明，这个文明的核心理念就是自由放任。国内的自由市场和国际的自由贸易，对内的自由放任政策和国际的自由贸易政策，相辅相成，同生同体，皆要求一个自我调节和稳定的价格体系。

仿佛是上帝神奇精妙的安排，金本位制恰好同时满足了国内的自由放任政策和国际自由贸易政策双重要求。金本位制让国内的货币和信用供应量受到“自然力量”的约束，货币当局或政府没有能力随意操纵货币。稳定的货币环境确保自由放任的“看不见的手”（价格机制）能最有效率地配置资源，价格体系变动主要源自相对价格的变化，而不是货币供应量的随意变化所导致的破坏性的物价水平波动。

各国货币皆以黄金为价值基础和最后储备，各国货币价值皆以黄金含量确立和固定，各国货币之间的汇率自然就是固定汇率。固定汇率不只是一个简单的汇率安排，本质上是国际贸易、国际收支和国际经济的调节机制。自从伟大哲学家和经济学界大卫·休谟首次完整阐述金属货币本位制下的国际收支调节机制—即著名的“硬币支付流通机制”以来，国际收支调节机制就是整个国际经济学的中心课题。

金本位制下的国际收支调节机制正是休谟的“硬币支付流通机制”。金本位制下，黄金是各国唯一接受的最终的国际支付货币（硬通货）。当一国出现贸易逆差之时，其黄金储备下降，黄金储备下降必然导致国内货币供应量下降，国内货币供应量下降一方面导致国内名义需求或支出下降，从而进口减少；另一方面则是国内货币供应量下降导致国内物价相应下降，从而刺激出口、减少进口。需求和价格两个方面同时导致进口减少、出口增加，该国贸易收支就逐渐从逆差转为平衡或顺差（贸易收支或国际收支之调节究竟主要是依靠财富效应或支出效应，还是主要依靠价格效应，经济学家争论了数百年，至今还没有完全一致的结论。综合理论和实证证据，公正地说，两个机制应该都起作用。至于哪个机制更重要，确实需要结合各国或不同经济时期的具体情况来看。对国



际收支调节机制的精彩讨论，参见《蒙代尔经济学文集》中译本第四卷，向松祚译，中国金融出版社，2003年第一版）。

上述调节机制只是静态结果。从动态调节机制看，由于各国无法自主随意操纵货币供应量来影响价格或贸易条件，各国贸易收支主要取决于各国生产力水平。生产力水平高的国家，能够以较低生产成本生产和出口大量商品，拥有大量贸易顺差和国际储备。一方面可以用国际储备资产去购买本国稀缺的商品，提升本国生活水平，另一方面可以将大量贸易顺差转为国内资本投资、提升国内生产力和经济增速；或者大量进行资本输出、投资海外、赢得资本收益和扩张本国势力范围。19世纪的英国、19世纪后期到20世纪的美国、德国、日本等等，皆长期以贸易和国际收支顺差带动本国经济增长和海外扩张。

易言之，金本位制就好像一只神秘而神奇的“看不见的手”，既能够很好地调节国内资源配置、鼓励创新、刺激经济增长，又能够很好地调节全球范围内的资源配置、鼓励各国提高生产力和扩大对外经济开放（自由贸易）。波兰尼认为，金本位制的基本功能之一就是将自由市场体系从国内扩展到国际。

然而，波兰尼的主题并不限于经济和贸易领域。他将金本位制的功能扩充到国内政治、国际政治和地缘战略领域。他认为，由于金本位制具有如此巨大威力和“魔力”，维护金本位制的运行就成为欧美文明各国的首要和至高的责任和义务，甚至是文明的基本象征。

为了维持金本位制，首先就要约束政府的财政权力。因为财政赤字必然破坏甚至毁灭货币兑换黄金的能力（钞票发行过多，黄金储备就无法保证货币与黄金的兑换）。因此之故，如何约束政府的行为就成为维持金本位制正常运转的首要条件，代议制或君主立宪（自由的主权国家）就是必然选择。

与任何货币体系一样，金本位制面临的最大威胁就是战争，尤其是列强之间的大规模战争。“欧洲资本主义经济体系面临的最大威胁既不是技术失败，也不是财务或金融失败，而是战争；既不是小国之间的战争（这些战争很容易被隔离），也不是大国强加给小国的战争（这些战争经常发生），而是列强之间的大规模战争或总体战。”为了防止列强之间发生大规模战争，就想要建立和强化欧洲的权力均势或均衡体系。欧洲的权力均衡体系始自拿破仑战败之后的维也纳合约，某种程度上确实大体保障了欧洲的“百年和平”（1815—1914年）。尽管百年之间，欧洲各国之间还是时常爆发战争。

到此为止，波兰尼建立一个极具吸引力和强有力的文化和历史解释架构，是一个逻辑非常严谨的分析架构。欧洲权力均衡体系和自由主权国际制度皆源自保障国际金本位制的需要，保障国际金本位制则源自自由市场经济和自由贸易之需要。这个体系一旦建立起来，它就从多个角度和方向相互加强。金本位制确保各国实施谨慎财政政策，避免出现财政赤字；金本位制将各国贸易和金融紧密联系在一起，大大降低了各国之间肆意发动战争的动机和可能性，从而确保欧洲权力均衡体系的正常运转。权力均衡体系确保各国自由主权政府的稳定，从而反过来保障各国自由市场经济的良好运行；各国内外自由市场经济的良性运转反过来又促进国际自由贸易和金本位制的运行。

就像一架环环相扣的精巧机器，19世纪文明的四大支柱可谓一荣俱荣，一损俱损。对机器的每一个支柱都要悉心维护。某个支柱一旦坍塌，整个机器就将分崩离析。这架精巧机器的关键或枢纽则是金本位制。

金本位制的作用超乎想象

100多年之后的今天，人们可能很难同意金本位制曾经拥有如此“神圣”的地位。今天，世界上没有多少人相信自己手中的钞票与中央银行金库里黄金有什么关系，虽然总有极少数人幻想有朝一日恢复金本



位制，这多少有点儿像极少数人幻想有一天能够恢复君权神授的皇帝制度。

然而，19世纪后期和20世纪初期，金本位制确实支配着西方经济乃至全球经济（是否支配着人类文明则很难说）。1870—1914年是国际金本位制的黄金时代。那个时代正是人类第一次全球化时代，是第二次工业革命的巅峰时期，是全球贸易和资本流动的黄金时代，是各国普遍开始迈向自由贸易的时代，是多个大国实现快速增长、快速崛起为世界强国的时代，是人类科技水平和生产力快速提升的时代，也是物价总水平长期相对稳定的时代。这一切的发生，即使不能完全归功于国际金本位制，至少有部分和重要的关系。我们只需要指出如下重要事实：

【各国纷纷迈向金本位制】

古往今来，金本位制并不是一个普遍的货币制度，而是一个历史上相当短暂的现象。当拿破仑战争结束，大英帝国正式确立金本位制之后，欧洲大陆和美国主要还是采取复本位制和银本位制。19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主导国际货币体系的是复本位制，因为欧洲大国法国和美国采用复本位制。当然，由于金银市场价格比例之变化，使某些国家在某段时期从复本位制演变为事实上的金本位制。譬如，1792年4月2日，美国首任财长汉密尔顿创建了美国的复本位制。美元（1786年，大陆议会采用美元作为货币单位）被定义为24.75格令的纯金和371.25格令的纯银，意味着双金属价格比例为15。然而当时主导国际货币体系的国家是法国。早在1785年，路易十四极为能干的财政部长卡罗纳将法国的双金属价格比例确定为15.5。1789年法国大革命爆发，新任美国财长汉密尔顿无法知道未来双金属价格比例应该是多少，他必须在国际局势极为动荡的形势下决定或猜测双金属的价格比例。后来证明他猜错了。1803年，拿破仑皇帝决心重整法国信用，他将双金属价格比例重新确定为卡罗纳时代的15.5:1。拿破仑的货币决策使得美国的白银价值高估而黄金价值低估，结果，美国建国后的头40年里，货币制度事实上是银本位制。到了1837年7月18日，美国国会通过法案，将美元的黄金含量确定为23.22格令，成色标准从11/12降低到9/10，于是双金属价格比例变成了16:1。现在，黄金价值高估而白银价值低估，白银流出而黄金流入，美国又转而变成事实上的金本位制。正如蒙代尔所说：“即使在复本位制世界里，多元主义是通则而不是例外，一些国家是真正的复本位制，另一些国家则是金本位制，还有一些国家是银本位制。”

奇怪的是，1870年之后，人类货币体系的主流趋势突然发生剧烈转向。主要大国纷纷正式实施金本位制。1873年，法国停止铸造银币。同年，德意志帝国决定实施金本位制。美国1879年停止银币铸造，正式迈向金本位制。紧接着，奥匈帝国（1892年）、日本（1897年）和俄国（1900年）实施金本位制。1900年，德国和美国以法律确认金本位制。这些国家代表了当时最主要的世界经济体，如果考虑到这些列强所拥有的庞大殖民地和附属国也必然采取类似的货币制度安排（附属国往往采取某种货币局制度），那么，金本位制已经覆盖世界大部分地区。当时仍然采取银本位制的主要国家只有中国、印度和墨西哥。蒙代尔说：“金本位制的确给世界带来了某种形式的货币统一，金本位制覆盖了世界货币交易的2/3。”

很大程度上，1870—1914年的国际金本位制是以英镑和伦敦为中心的国际货币体系，尽管1872年美国已经取代英国，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当然，英镑对当时国际货币体系的支配程度，难以与布雷顿森林体系和美元本位制时代美元对国际货币体系的支配程度等量齐观，与英镑竞争的货币包括法郎、美元和马克。英镑在多个竞争对手里略胜一筹。

伦敦金融中心的地位其实更加重要。早在18世纪，伦敦就取代阿姆斯特丹，跃居欧洲或全球金融中心之首位。到19世纪后期，伦敦已经发展成为名符其实的国

际货币、贸易、信用和资本中心，以伦敦为中心和出发点，构成了一个遍及全球的庞大信用和资本网络。英格兰银行成为事实上的全球中央银行（尽管它仍然是一家私人股份制银行）和世界各国效仿的样本，伦敦的股票交易所和外汇交易全球首屈一指，它还拥有全球最庞大的黄金储备。金本位制是支柱，伦敦是中心，英格兰银行则是神经中枢。纽约、巴黎、柏林、维也纳、阿姆斯特丹算是全球金融的分中心。我们从罗斯柴尔德王朝的分支机构就可以看出当时全球金融势力的分布。罗斯柴尔德是整个19世纪首屈一指的银行家族。“罗斯柴尔德家族不受任何国家管理。这个家族是国际主义原则的极端化身。家族成员只效忠自己的王朝。罗斯柴尔德所创造的信贷，成为各国政府之间唯一的超主权媒介，成为推动世界经济快速增长的唯一超国界引擎。”

罗斯柴尔德银行财团的五大分支机构分别位于伦敦、巴黎、柏林、汉堡、维也纳（后来还有纽约），其中伦敦为最大分行和实际总部。

19世纪后期见证了人类第一次全球化时代，见证了第二次工业革命的巅峰时期。

令人惊叹的经济增长，急剧扩张的全球贸易和全球资本，飞速的技术进步，铁路、远洋轮船、电报和电话相继发明，人类相互沟通和人口迁移达到史无前例的速度和规模。滚滚而出的欧洲资本流向全球每个角落，印度的港口、马来西亚的橡胶种植园、埃及的棉花种植园、俄罗斯的工厂、加拿大的水稻田、南非的黄金和钻石矿山、阿根廷的牧场、柏林至巴格达的铁路、苏伊士和巴拿马运河、美国的铁路、油田和钢铁厂。

罗斯柴尔德、摩根财团、巴林兄弟、布朗兄弟、雷曼兄弟、库恩·罗布……他们叱咤风云、点石成金，将欧洲资本源源不断地输入世界各地，在促进全球贸易、投资和经济繁荣的同时，也缔造了显赫的家族金融帝国，创造了超乎想象的巨大财富。

当然，金本位制笼罩下的国际金融体系绝不是风平浪静，金融危机、银行危机、货币危机才是家常便饭，时刻威胁着金本位制的生存和国际金融的稳定。幸运的是，1870—1914年之间的国际货币和金融体系总体稳定、有效运转。依今天的标准来看，确实称得上是一个奇迹。百年后的1970—2014年，恰好是国际货币和金融体系急剧动荡的岁月，从任何一个指标上看，都是人类货币历史上最不稳定的时期之一。

从大历史视野和大时间跨度来回望巅峰时期的金本位制（1870—1914年），我们发现，作为人类历史上的第一个全球性货币制度，它至少从如下五个方面直接或间接地改变了国际货币、金融、经济和政治历史的演变历程。

其一，金本位制创造的相对稳定的国际货币环境，助推多个国家——美国、德国、法国、英国、日本、俄罗斯的经济实力迅速膨胀。1870—1914年，是全球许多国家的经济普遍出现快速增长的时期，以美国、德国、日本的经济奇迹最为显著。19世纪后期快速经济增长所形成的全球权力格局，某种程度上一直维持到今天。那是一个大国崛起的时代，是全球权力格局剧烈嬗变和转移的时代。率先崛起的西方大国（英国、美国、德国、法国等西方列强）凭借强大的经济实力和军事势力，将早已持续数个世纪的海外殖民扩张和侵略掠夺战争掀起新的高潮。以海外殖民和势力扩张为核心战略目标的帝国主义成为时代的主流政治理念，老牌帝国主义和新生帝国主义共同瓜分世界，世界多数地区则沦陷为帝国主义的全球殖民地和半殖民地，既奠定了20世纪的全球权力格局和国际秩序，也为两次世界大战埋下祸根。事实上，20世纪后半期开始引发人们高度关注的“不公正国际经济秩序”和“南北秩序”，正是19世纪下半叶已经定型的国际秩序。

其二，金本位制让所谓自主、自发、自动的市场调节机制成为主导人类经济政策的基本理念。金本位制、自由贸易、低税收或零税收、小政府和大市场，堪称19世纪经济政策理念的四大支柱，最重要者是金本位制。自从休谟系统阐述金属货币本位制的调节机制以来，多数人坚信金本位制的调节机制是一个真正自动和自主的调节机制（Self-Regulating Mechanism）。实际上，金本位制的调节机制并没有那么自动和自主，它的正常运作需要政府和货币当局采取各项政策、精心配合、小心维护。

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教授依成桂林的名著《黄金枷锁》和许多其他学者都曾经系统深入分析过金本位制的实际运作，结论基本是一致的。首先，金本位制国家的政府必须坚持实行谨慎财政政策，避免大规模财政赤字，一旦财政赤字高企，公众对黄金兑换的信心就会崩溃，疯狂的挤兑将迅速耗尽任何国家的黄金储备。许多国家历史上都有过类似的惨痛教训。其次，货币当局或金融业必须采取措施避免信用过度扩张，一旦信用过度扩张，导致资产

价格泡沫和泡沫破灭的危机，银行和金融机构濒临破产，同样会严重损害公众对金本位制的信心，造成大规模黄金挤兑，摧毁金本位制。最后，金本位制各国需要精诚合作，相互支持，加强宏观经济政策的协调和磋商。一旦某个国家出现严重的贸易逆差或国际收支逆差，其他国家就需要及时提供暂时性的救助或支持措施，包括提供以主流储备资产计价的贷款或援助。1870—1914年的金本位制之所以能够相对平稳运行，客观地说，主要得力于英国中央银行——英格兰银行比较完善和灵活的货币政策操作、以及主要大国中央银行之间的密切合作。

金本位制的实际运作经验，揭示了一个基本真理：完全自由放任的市场调节机制或市场经济其实是一个不切实际的乌托邦；现实生活里根本不可能存在完全自由放任的市场调节机制。任何形式的市场经济都必然需要规则、需要约束、需要法律、需要合作、需要救助。然而，金本位制巅峰时期的历史经验却创造出一个恒久常新的神话和迷思。这个迷思和神话经过漫长的历史演进，变成今天的市场原教旨主义和“华盛顿共识”。

与金本位制自由、自主、自发的理念同时兴起的另一个基本政策理念则是自由贸易。斯密1776年出版《国富论》之时，就高举自由贸易大旗。19世纪初期的法国，有许多经济学者高唱自由放任的颂歌，然而，直到1846年英国正式废除《谷物法》，自由贸易才逐渐成为欧美经济政策的主流思维。很快，自由贸易的理念被推上“神坛”，成为一种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观念，同时也迅速蜕变为西方列强坚船利炮和帝国主义政策的“护身符”。为推销所谓的自由贸易理念，或者以自由通商为旗号，帝国主义到世界各地发动了五花八门的侵略战争。殖民侵略、血腥战争、领土割让、不平等通商条约此伏彼起，给世界许多国家的人民造成深重灾难。全球化、工业革命、自由贸易、资本扩张，从来就不是彬彬有礼、温情脉脉的情人派对，往往都是赤裸裸的掠夺和瓜分。马克思对资本主义原始积累精彩而深沉的描述和分析，同样适用与工业资本主义和金融资本主义时代。

其三，金本位制巅峰时期的辉煌成就，很快转变为一种近乎宗教般的虔诚信念，无数政治家和金融家对金本位制的迷恋和热忱可以说达到了心醉神迷的程度。其实，黄金作为货币本位或直接用作货币，至少可以追溯到公元前800年，金币的历史起码源自公元前700年。随后几千年里，黄金一直是人类货币历史舞台上的重要演员或主要角色。尽管如此，只有到了金本位制巅峰时期，人们才对金本位制货币制度赋予某种神圣的意义。

仿佛是有一种魔力笼罩着人们的思维，金本位制是那个时代最坚定的政策信条，是国家信用的象征，是国家强盛的标志，是国家必不可少的荣耀。黄金是全球货币和金融体系的生命线，是所有货币的价值之“锚”，是整个银行体系的基石，是战争或动乱年代的安全庇护所或天堂，是当时银行家、金融家以至中产阶级的第二宗教信仰。中产阶级开始崛起为新财富拥有者和储蓄供给者，他们深信只有金本位制才能制约和管理货币发行，才能保障他们的储蓄或财富不被通货膨胀“小鬼搬家”。国际银行家当然是金本位制最坚定的信奉者和捍卫者。从伦敦到纽约，从巴黎到巴黎，从阿姆斯特丹到维也纳，银行家的共同信念是金本位制，一种宗教般的信念，一种超越时间和地域的信念，一个天赋的信念。

金本位制强化了所有审慎和保守的经济政策哲学，乃至一切谨慎和保守的生活方式和道德准则。文学批评家和哲学家曾经迷惑不解，为什么19世纪的许多欧美人对金本位制具有那种非常愚蠢且难以自拔的高度信任。1923年，凯恩斯发表《货币改革论》，将金本位制贬为“野蛮人的遗迹”、强烈呼吁英国不要回归金本位制，转而采取信用货币和浮动汇率，他的新经济政策被英国精英人士普遍看做异端邪说。一个货币制度被如此深远和广泛地同社会生活的道德准则联系到一起，被赋予如此复杂的社会意义，确实令人匪夷所思。

波兰尼以滔滔雄辩之辞阐述了20世纪初期的金本位制信条。“对金本位制的信任成为时代的信条。有人嘲弄这种信条天真幼稚，有人不遗余力批评这个信条，有人认为这种信条是鬼迷心窍，抛弃圣洁的精神，拥抱贪婪的肉欲。黄金自身的价值究竟是源自它所包含的劳动（社会主义者的主张），还是源自它的实际用途和稀缺性（主流经济学的主张），这一点都不重要。重要的是人们相信银行钞票之所以有价值，是因为它代表黄金，这一点则是完全一致的。天堂和地狱之间的战斗不牵涉到货币事务，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者在金本位制那里达成奇迹般的统一。